

朱 雯 罗 洪 著

# 往事如烟

朱雯早年曾写过小说，写过钟情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于是成家；罗洪是位多产而风格独特的着丰富的人生阅历，21岁便开始经称誉一时。

他和她，是文学的知音，生活的共同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虽然却拥有着永恒的人世真情。晚岁回忆起从三十年代开始活跃于中时，一切都似乎显得那么淡淡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脉由此展化人的品格与心程路向由此浮现的叙述中，感受到深长深长的回味……



散文，然而却更了著名的翻译女作家，她有写作生涯，曾



伴侣，相濡以沫地送经风雨坎坷，暮年，当他们国文坛的经历的，淡淡的，然开，中国一代文化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6.7  
Z83d

朱 雯 罗 洪 著

# 往事如烟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屋丛书

往事如烟

朱雯 罗洪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5 插页 6 字数 198,000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611-9  
G·160 定价: 1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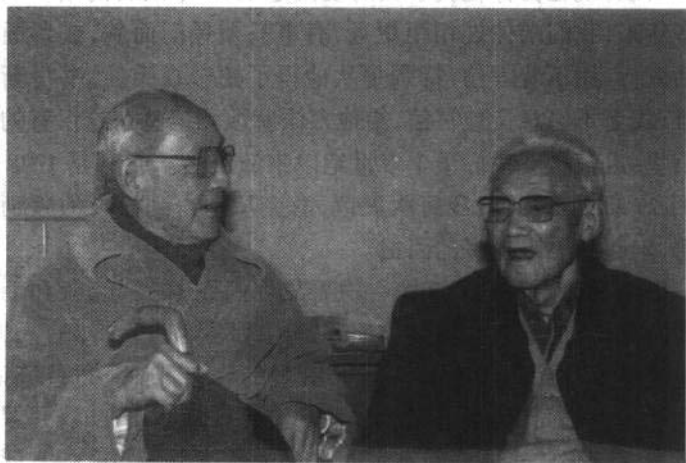
# 忆 往 怀 旧

朱 雯



## 重读巴金来信

我跟巴金相识,已有五十八年。在他在我,像这样的朋友,眼下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我们论交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来往的书信可说是很少,而迄今还保存在我手头的则更是寥寥无几。1931年至1937年,巴金写给我的信比较多,我一直珍藏着,可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在敌机轰炸下逃离故乡松江。仓卒成行,只带出了一点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家



作者至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先生(1991年)

里，一随天命。不到半年，敌机对这个离上海很近的城市轮番轰炸，使我家夷为瓦砾，所有珍藏着的朋友们的来信自然都化成了灰烬，其中就有巴金写给我的信。

抗战八年，大家萍飘无定，通信不多。胜利后回到上海，我们时常见面，一般也不大写信。四十年代后期，为了我翻译出版德国作家雷马克的作品，曾经有过若干书信往还。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修改和重排俄国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安排出版法国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的中文译本，我曾得到过巴金的一些来信。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为了翻译上的问题要向他请教，或者为了这样那样的事情要跟他商量，我们也曾有过一些书信来往。可是十年动乱，把我家所有的图书、文稿、信件统统查抄一空，二十多年来珍藏着的巴金的信连同其他一些朋友的信就这样又遭到一场浩劫，落得个片纸不剩、只字不留，可以肯定那也早都成为灰烬了。

所以，现在留存在我手头的仅仅是1976年以后的信。而这十多年来，我们的住处相距更近，有事只须登门面叙，或者通个电话就行，用不着写信，特别是从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书写渐感困难，我更不愿意让他写信，给他多添麻烦。但就在这仅有的几封信里，也蕴含着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友情。尤其是1978年12月27日的那一封，我每次展读，总会从中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勾起我无限美好的回忆。

巴金在信上写道：“我第一次看见你们在1931年，我和毛一波同游苏州，他把我介绍给你们。”是的，那是在1931年春天，准确地说是5月9日。1931年5月18日的《文艺新闻·每日笔记》里刊登过一则简讯，报道巴金和毛一波九日到苏州，与我和罗洪同游虎丘诸名胜。当时我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爱好文艺，课余学习文艺创作和翻译。从1928年起，经常向一些文艺刊物投

稿,因而结识了也为某一杂志经常撰稿的作家毛一波。那时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们经常通信。1929年8月,他的短篇小说集《少女之梦》在上海出版,我给它写了一篇书评,在刊物上发表。他同意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看法,把我引为知音。同年11月,我在苏州创办了一份文学旬刊《白华》,他多次寄来稿子,给我以很大的支持。1931年5月,他同巴金一起来看望他们的朋友杨人楩。杨人楩是位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专家学者,那时正在苏州中学教书,业余爱好京剧,以票友身分多次参加当地的演出,颇负盛名。这次彩排,他专诚邀请巴金和毛一波到苏州来观赏。毛一波是我认识了两三年的朋友,趁这机会便同巴金一起到东吴大学来看我。这就是巴金在信里所说的“他把我介绍给你们”。

巴金对东吴大学并不陌生。1926年他三哥李尧林曾在这里念过书,那年寒假他到苏州来看过他哥哥,还在学生宿舍里住过一晚。我那时已经在读东吴附中的高二,但我不认识他在大学读书的哥哥。

1927年春天,巴金去法国留学,1931年5月是他第二次来到苏州,从法国回来已有两年,成名作《灭亡》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并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是相见之下,他全然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却是那么谦和,那么诚挚,那么热情,使我很受感动和鼓舞,也坚定了我终身从事文学工作的决心。

那天见面,还相约第二天早晨在吴苑茶室品茗,并去留园、虎丘等处游览。翌晨一大早,我和罗洪就已等在那里,我们一起吃了早点,便雇了一辆马车出发。马蹄的得得声和车轮的辘辘声,挟着我们的笑语欢声在空寂的街头回响。从留园到虎丘那一段,道路开阔,马便小跑起来,两边的垂杨有时拂打着我们的脸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春的气息。这对久居市廛的我们来说,



立中学教书。1934年春,我们邀请巴金到松江来玩并且约定同去佘山游览。那天早晨,他从上海乘车来了,一下火车,我们就把他径直接到早已雇好的船上。当时去佘山的交通,只有水路,从上海到佘山,也以取道松江最为便捷。我们的乌篷小船在曲里拐弯的河道航行,一路发出轻微的汩汩的声响,给人一种安恬宁静的感觉,跟五年前坐着马车在虎丘官道上疾行,确实是别有一番情趣。那天我们玩得很欢畅。这是我第一次游览佘山,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回到松江,我们招待他在新松江社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送他乘车回上海。

1936年秋,巴金再次来到松江,同行的还有靳以、黎烈文等,这是头天晚上在《文季月刊》宴请上海部分作家的筵席上约定的,由赵家璧陪同乘车到来。

在松江,我们一起游览了醉白池、方塔、西林诸名胜,大家还品尝了松江有名的四鳃鲈鱼,当天晚上他们就搭夜车回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罗洪每逢有事去上海,总要去看望巴金,而他也总是每次邀我们上餐馆或酒家去小吃。罗洪至今还记得,她第一次吃西餐就是巴金请的。巴金比我长六岁,我们是把他当做兄长看待的,而他也确实像兄长一样帮助我们,照顾我们,指引我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道路上,他是我们毕生难忘的指路人,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抗战期间,我们在后方飘荡,从浙江桐庐、江西南昌,到湖南长沙,1938年初到了广西桂林,我在当地一所高级中学任教。那年秋天,巴金从广州撤退到桂林,在那里我们又重聚了,而且还第一次会见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萧珊。在桂林,我们四个人,还有王鲁彦和林憾庐,一起游览了月牙山和七星岩,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11月底,我们就返回“孤岛”上海,我一面教书,一面主编《天下事》和《国际闻》两个综合性翻译刊物。随后不久,大

约在 1939 年 2 月,巴金也从桂林回来,我们又在上海见面。1940 年 7 月,他去了昆明,我们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撤退到了内地。1945 年夏,我因事去重庆,在那里又与巴金相聚,但我去不久就回安徽屯溪,接着就是抗战胜利。我们先后回上海,他和萧珊大约在 1946 年四、五月间才从重庆回来。此后的四十多年,我们一直住在上海,跟抗战时期相比,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两家交往比较频繁,这不仅由于我们跟巴金的旧交,而且更由于萧珊和罗洪在《上海文学》、后来在《收获》的共事。她们在一个编辑部工作,又在一张桌子上办公,朝夕相处,自然就成了十分亲密的朋友。哪里料到这以后的十年,大家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这场大灾难中,萧珊被迫害致病,于 1972 年 8 月 13 日离开了人间,而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家里人竟都一个也不在她身边,包括巴金在内。这又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 8 月 13 日,咱们历史上不也有过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八·一三”吗?

我同巴金订交的五十八年,正是风云变幻、战乱频繁的五十八年。“大家能够活到今天,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完全同意巴金在信里说的这句话,也完全理解他可能指的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十年,是使我们大家受尽折磨和屈辱的十年。历史为我们证明,巴金毕竟是个巨人,他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浪打,却始终屹然挺立在时代的激流中。我在他八十华诞的 1984 年,献给他一首贺词调寄《临江仙》就表达了他这种崇高精神的敬佩。词云:

旷代文豪今八十,巍然一树苍松。十年霜雪压重重。  
沉浮同石火,得失笑鸡虫。五十三年弹指耳,相看策杖

扶筇。初承馨欵在吴中。隆情传彩笔，微意献瑶钟。

从一场荒谬的噩梦中醒来，巴金又重新握起那枝被迫搁置了整整十年的笔，进行战斗。他在信里说：“我还要争取多做工作。”还说：“我最近一直在写文章，虽然写得慢，但始终未停笔。”这工作，这文章，指的就是他后来花了八年功夫完成的《随想录》五卷。《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以及《随想录》的《总序》，正是他写给我这封信之前二十多天写的。《总序》里说得更清楚：“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他也希望我们“多做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虽然也做了一点工作，却并没有取得大的成绩。这是我今天重读巴金来信时候感到十二分抱愧和遗憾的事。

1989年12月，上海

## 致沈从文

从文兄：

谢谢您让王西彦兄带来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垂问。

自从1946年(?)在上海一别,到如今已有三十多年。不知道您还记得没有,那一次我是到爱棠路(现在叫余庆路)去看望您的?自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也参加,但我除了在会场里遇到一些熟人以外,都没专诚去拜访过朋友,包括您在内。可能是1980年吧,您来过一次上海,等我从巴金兄那里知道这个消息,您已经回北京去了。

违教虽久,但我思念之情是无时或已的。我一直牢记着在我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您曾给我的启迪和指点。当我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书,就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您写的小说。正是在您作品的启示下,我开始了最初的习作。1929年我用“王坟”这一笔名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多半是对您作品的幼稚的模仿。后来出于仰慕,我冒昧地向您请教,承您不弃,每次都给我极其诚恳的答复。那时您写作很忙,身体又很不好,可是您总是有问必答,有答必详,在那些几百字、上千字的长信里,又总是诲尔谆谆,不厌不倦,从创作到生活,给我以那么热情的教导。那些长信,也深深地启发了罗洪,

使她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若干值得自己回顾的脚印。可惜那些珍贵的来信,都在抗日战火中全部给烧毁了。如果那些信件(我估计有五六万字)能够保存到今天,那该是一部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的年青人多么有价值的创作和生活的教科书啊!

去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中国书店影印了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在那上面我无意间发现一篇当时(1933年1月8日)写下的拙作,里面摘引了您的一封半信:半封是1930年您从吴淞写给我的,一封是1932年我和罗洪在上海结婚的时候您从青岛发来祝贺的。这一封半唯一留下来的大札,虽然已经不是您的手迹,但“硕果仅存”,也是弥足珍贵的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开始跟您通信,大概不会晚于1930年,很可能是1929年。我跟巴金兄认识,则是在1931年春天,那一回他同毛一波兄到苏州来,由毛一波介绍,我才认识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你们两位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不过因为巴金兄后来长住上海,所以交往比较多,而您则远在北方,以致久疏音问,但是对您的高谊厚爱,我是没齿不忘的。直到最近,我还在一篇文章里激动地抒发了我的感戴之情。我回顾自己五十多年来走过的文学道路,我说:

……这方面,给我影响最大的作品,是我国的鲁迅、沈从文、废名,日本的长与善郎、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和美国的厄普顿·辛克莱。沈从文是我当时最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我差不多每篇都反复阅读,揣摩学习。我最初学写的几篇小说,实际上都是对他(还有废名)的作品的拙劣的模仿,属于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类。我当时经常向

他请教,在给我的许多长信中,他总是不厌其详地指点我怎样写作,怎样生活。在我的文学道路上,他是第一个热心的引路人;在我的生活中,他永远是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他当年住在上海,健康情况很差,可是为了生活,却不得不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埋头写作。可以想象,为了指导一个后学的青年,他也是一边流着鼻血,一边给我写那一封封长信的。可惜这些珍贵的手札,跟我所有的藏书、整个的家一起在抗日战争中统统被敌机炸掉了。在这里,我向沈从文先生表示我一向埋藏在心里的感谢之忱,并遥祝他健康长寿!

五十年过去了,可就对您的文章,依然十分爱读。去年看到香港有一家图书公司出版《从文散文选》的广告,我曾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托人在香港购买了寄来。其实,您的《从文自传》,不久也在北京出版了。那“自传”,我作为一个读者,很希望您能把它继续写下去。本月17日,《新文学史料》有位编辑来访,也曾谈起这个事情,可见我的希望也正是千万读者的意愿。

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新文学的爱好者,过去写过一点东西,后来翻译过几部作品,都是简陋可嗤的。罗洪专搞创作,写了一些小说,质量自然也不高。只是为了留下一点在文学道路上走过的脚印,近年来把旧作选编了几个短篇集《践踏的喜悦》(已由香港文学研究社于1981年出版),《群像》(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和《浮蚁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请原谅我啰啰苏苏写了这么多的话,因为阔别了几十年,怎么说我也要把心里想的统统都说给您听。看来五十多年前那种唐突冒昧的稚气,至今还没有改掉咧。

敬祝您和您的夫人  
健康长寿

弟 朱雯  
1982 年 11 月 29 日于上海

## 柳亚子先生的两封信

十年浩劫给我带来的最巨大的损失，莫过于一些书信和文稿的散落。文稿，我的损失还不算多，只丢了一部未完成的译稿德·桑克梯斯的《意大利文学史》，而书信，则全部在十年动乱中失落。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为文稿还可以重译或重作，而书信则是彼时彼地写下来的东西，不可能重新获得，何况写信的朋友有的已经故去。这其中最使我痛惜的是柳亚子先生给我的两封信。

我认识柳亚子先生是在 1935 年，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在那以前，我是久仰柳先生的大名。1930 年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有幸见到南社诗人陈去病先生，他就跟我谈起过柳先生的道德文章和诗才书艺。1932 年我在省立松江中学教书，接受高尔松、高尔柏昆仲的邀约，与徐声越（震罅）、王起（季思）、陆维钊、施蛰存、沈联璧一起编注一套高、初中共十二册的语文课本《当代国文》，其中的汉语语法和应用文部分由我负责编写，先是按照教学大纲插编在课本里，后来分别印成单行本《当代文法》和《当代应用文》，这两本书的封面都由柳亚子先生题签，我这才知道高氏昆仲跟柳先生极熟。他们知道我对柳先生心仪已久，便于 1935 年某一天由尔柏兄专诚陪我去上海辣斐德路（现在的复兴中路）寓邸拜见了先生。他当时还不到五十，举止言谈，给